

◎ 赖天德 著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

—— 赖天德评论文选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制、
事责
, 保
丸法
发现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

——
赖天德评论文选集

◎ 赖天德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赖天德评论文选集 / 赖天德
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04-022168-8

I. 中… II. 赖… III. 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中国—文集 IV. G807.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086号

策划编辑 曹京华
版式设计 韩璐儿

责任编辑 王冰怍
责任校对 陈 莲

封面设计 韩璐儿
责任印制 陈伟光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2141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网 址 <http://www.hepsd.cn>

邮政编码 100011

<http://www.hep.com.cn>

总 机 010-5858100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 张 24

印 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00 000

定 价 39.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2168-00

■ 作者简介



赖天德 1937年生，笔名夏峰、夏雪、闻听、司云，福建省上杭县人，编审。历任《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学校体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体育记协）理事，北京体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

1960年于北京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调入《学校体育》（《中国学校体育》前身）杂志社工作。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主张当一名学者型的编辑，走编辑与学者相结合的道路，并身体力行，始终坚持学校体育科学研究，积极从事学术活动，经常应邀赴全国各地讲学。二十多年来，亲自为《中国学校体育》杂志撰写卷首、编辑部文章及特约评论员文章百余篇；撰写的学术论文《当代中国学校体育发展趋势》、《论学校体育的本质与目标》、《试论当代中国学校体育教学的特色》、《论素质教育与学校体育改革》、《论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等曾参加全国和国际学校体育学术交流，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1993年出版了《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研究》文集，该文集于1994年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优秀专著奖；2003年又出版了《学校体育改革热点探究》；2004年主编出版了初中《体育与健康》教材与教师教学用书；此外，还参与了《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学校体育教学探索》、《解读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的编写。

■ 序

收录在这本文集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以《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卷首、编辑部文章及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刊出的，另有一小部分文章刊登在《体育教学》杂志与《中国教育报》上。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应该是关心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广大读者所熟悉的。

得知高等教育出版社要将赖天德同志的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以文集的形式出版，我非常高兴。此举不仅是送给赖天德同志七十华诞的珍贵礼物，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学校体育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好事。这样说，我自认为是有充足理由的。

其一，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跨越了世纪之交，历时二十余年。沿着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脉络，读者可以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与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其二，这本文集之所以取名为《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就是因为收录在这本文集里的

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对当时学校体育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评述。由于其中的一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使文中的观点或看法，今天读起来，仍有切中时弊之感，仍是判断是非曲直、克服思想障碍、推动学校体育改革的有力武器。

其三，其中一些文章是对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学校体育政策法规与改革举措的解读。这些解读的篇幅不长，但却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这些政策法规与改革举措的精神实质与基本要点，以及对推动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与作用。细读这些文章，对于如何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加强学校体育的科学化管理，推动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四，还有一些文章是与广大体育教师，特别是与中小学体育教师共同讨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直面人生，如何面对困难和偏见，如何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如何为人师表，如何处理师生关系，刚毕业的新教师如何走好人生关键的一步等问题，这对于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想品德与专业化水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不少次，我遇到一些青年教师，他们都说特别喜欢看《中国学校体育》的卷首，这也许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我与赖天德同志相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到国家教委工作之后。其后由于职务的关系，我担任了《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的编委会主任，那几年，他恰好担任杂志的主编，由于工作的关系，接触的机会就多了。退休后我们又都在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工作。每当回忆起逝去的时光，我们都为那些年《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的发展而倍感欣慰。在我任编委会主任及退休后，应赖天德同志和编辑部之邀，也为《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写过几篇卷首。记得开始写头一两篇时，提笔前总要找赖天德同志发表过的卷首看一看。后来对卷首的写法逐渐熟悉了一些，但每次下笔时仍有些忐忑不安。由此想到赖天德同志撰写的这百余篇卷首与其他评论文章所付出的艰辛。

赖天德同志诚邀我为这本文集作序，我自知能力和水平有限，曾有所犹豫，但由于我们既是多年的老同事，更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也就鼓起勇气写了这篇东西。如有不当，敬请读者原谅。

宋尽贤（2007 年元月于清华园）

（本文作者系原国家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现任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理事长）

■ 前 言

1979年“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即“扬州会议”）的召开与《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为中国的学校体育改革吹响了号角。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学校体育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的学校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全国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进程，既是坦荡的，又是艰辛的。在这一改革进程中，笔者曾为《中国学校体育》、《体育教学》、《中国教育报》等撰写过一些卷首、编辑部文章、特约评论员文章及学术争鸣与评论文章，大多是针对当时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和主要倾向而写的。这里选编若干，虽是星星点点，甚至有的似乎已是时过境迁，有的由于矫枉而过正，但这多少也还能为我们回眸学校体育的改革历程，反思学校体育改革的这段历史，提供一点蛛丝马迹。

这本文集如何编排？是按内容的性质分类编好，还是按写作时间的先后编好？笔者总也

举棋不定。后来觉得，这些文字既然是“历史”，那就按历史的先后来编排吧。这样做虽然历史的脉络比较清楚，但查阅起来就不太方便了。本书上篇选编的是笔者为《中国学校体育》杂志撰写的卷首，下篇选编的是笔者撰写的部分编辑部文章、特约评论员文章及学术争鸣与评论文章。之所以没有将上下篇统一编排，主要是考虑到两类文章在性质上多少存在一些差异。

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由于历史的局限与本人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所限，以及不同时期学校体育改革中出现的主要倾向不同，所以，在这些文章中，许多认识还都比较肤浅与幼稚，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乃至错误，而有些性质相同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所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只是因为这些文字都是“历史的产物”，所以不做任何修改，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欢迎批评与指正！

赖天德

2007年元月于北京体育大学

他在为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呐喊

——为《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出版而作

我和天德同志说得上是忘年之交。记得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关于体育名词概念和我国体育方针政策研讨会，我们就是在那次会上相知相识的。在那次研讨会上，对有关体育的概念界定及我国体育发展的重点问题，与会者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待少数学者的不同意见，是本着学术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进行平等的交流与讨论，还是以势压人，把它上纲上线，组织发动人来“批判”，对此，与会者持有不同的态度。当时，天德同志作为会议文件组的成员，比较客观、全面地向学会领导汇报了会议各方的发言情况，并明确地说出了自己对少数学者不同学术观点的认识与态度。他的意见得到了学会领导的采纳，在会议总结报告中，不仅没有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加以批判，反而表扬了他们敢于发表不同学术观点的勇气和精神。天德同志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是严谨的、理性的，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精神的，给我和许多与会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我和天德同志都是搞学校体育编辑工作的，后来又在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一起工作，相互接触就多了起来，逐渐地成了知心朋友。我看他为人谦逊、勤奋好学，就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体会告诉了他：“当一名学术书刊的编辑，光文字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仅要熟悉编辑业务，还要了解学校体育改革的实践，更要有学校教育对学校体育深厚的理论功底。只有站在学校体育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才能把握学校体育发展的脉搏，了解基层体育老师的需要，驾驭杂志的编辑方向。”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把我这句话牢牢地铭记在心，努力地付诸实践。他曾对我说，自那以后，他就如饥似渴地重新学习了教育理论、体育理论和编辑学的基本理论等；请教学校体育的专家、学者和老编辑；到基层中小学去看体育老师上课、组织指导课间操、

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体育训练；和老师们一起搞教研，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积极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广泛地联系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体育教师，了解他们的心声；体察基层学校和体育教师遇到的问题、困难和需要……尽可能地使他所主编的《中国学校体育》杂志，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学校体育的实际。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使他逐渐成为我国学校体育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

新中国的学校体育和各行各业一样，有自己的辉煌，有自己的理论建树，更有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特色。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从教学思想到教学内容，从教学方法到教学评价，全都是陈腐的、落后的，没有任何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在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来学校体育的功过是非，如何对待学校体育的继承与发展，如何分析当前学校体育改革中的成绩与问题，如何处理学校体育研究过程中学习、引进新观点、新思维和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体系的关系等问题上，天德同志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摆事实、讲道理，全面客观地分析与论述问题。既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别人的观点，又不强词夺理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虚心向一切人学习，但不迷信任何人”，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我和天德同志相识二十余年，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工作问题和学术问题，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无论讨论什么问题，总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无拘无束，不论异同，都一吐为快。他观察事物敏锐，分辨能力强，虽然我们都主张直言不讳，但他却比我稳健、成熟，看不准的事情，不轻易“发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一书，主要选编了天德同志为《中国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杂志撰写的卷首、编辑部文章、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部分针对性较强的学术评论文章。这本书既不是一般的论文汇编，也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更不是什么高深理论的探索。它是作者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呐喊，是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历程的写照。它反映了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新经验。作者站在学校体育改革的前沿，把握学校体育改革的脉搏，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锋，对学校体育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极端化的言论与观点，偏离学校体育目标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说法，提出质疑，直言不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心平气和地参与讨论，对明显违背党和国家政策法规的做法提

出批评，在学校体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撰写的卷首，对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尤其是体育教师，常常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正像有的体育教师说的：“当我们接到《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后，首先要认真阅读的就是卷首，因为它是杂志画龙点睛的力作，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了解学校体育改革的动向与发展趋势。”今天，作者将这些卷首选编成册出版发行，奉献给读者，可以使我们看到我国学校体育在这一历史阶段发展的脉络，为我们总结学校体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反思、研究发生的问题提供历史的背景与线索，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料。

当我托起这本沉甸甸的书稿时，不仅因为书中凝重与深邃的文字，值得我们仔细地思考和掂量，而且还因为在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作者在沉思的身影。虽然书里的每篇文章都不长，但它所反映的主题和事件，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既没有云山雾罩的空话，也没有让人头晕目眩的高论，更没有哗众取宠的华丽辞藻。《中国学校体育》作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一份专业刊物，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大力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学校体育的政策法规，为广大基层学校体育工作者排忧解难，为学校体育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提供线索和背景资料的重任。作者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有书为证。

王占春（于 2006 年岁末）

（本文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
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咨询委员）

师生、挚友、伙伴

——我与《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的作者

我与《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的作者——赖天德老师，既是忘年之交，又是师生，更是学术上的挚友和伙伴。

我与赖天德老师是忘年之交，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和赖老师都生活在北京体育学院的家属区大院，那时我叫他赖叔叔，知道他乒乓球打得好，并喜欢钓青蛙。和赖老师真正的相交可以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他刚调到《学校体育》编辑部工作，我还在上大学，但我知道他爱学习，爱研究问题，经常写文章，探索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革，而我则为《学校体育》画点插图和尾花什么的，挣点儿稿费。算起来，那时的赖老师比我现在还年轻，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就像现在这么沉着和老练，不知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早熟呢，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老也长不大。

赖天德老师与我是师生，是因为赖老师一直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教师，而我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师生关系名正言顺，虽然我没有跟赖老师学过打乒乓球，但也逃不出师生的辈分。赖老师真正成为我的老师则是在我留学日本以后，那时我常翻译点日本学校体育的小文章，寄回国内在《学校体育》杂志上发表。当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不久，带着一点民主和科学气息的海外来稿备受国人关注。在那“铅字就是真理”的年代里，几篇小文能在权威的杂志上发表，把我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似乎觉得自己就是个“学者”了。但暑期回国给我当头棒喝的就是这位赖老师，一见面就请教我一大堆的问题：什么是后工业社会？什么是快乐体育？什么是游戏论？什么是小集团教学？什么是体育文化论？等等。我的回答往往不能使他满意，我自己也不满意。通过与赖老师的经常交谈，使我对诸如逻辑、辩证、严谨、全面、细致、一知半解以及不求甚解等词语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可以说，是赖老师告诉了我，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有的态度；也是赖老师告诉了我，什么叫做

“学问”和学问应有的规范。

我与赖天德老师成为学术上的挚友和伙伴，是在我回国工作以后的事情。我们共同在《中国学校体育》杂志上发起过“为什么要教背向滑步推铅球”的讨论，掀起新一轮关于体育教学目标和体育教材改革的大讨论；我们一同去四川的岳池筹备“全国农村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在那里我们一起设计新农村的学校体育发展模式；我们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演过“双簧讲学”，共同阐述我们对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各种看法；我们用“丛文”（表示两个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的笔名，撰写过《“成功体育”的呼唤》等文章，不懈地思索和探讨着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中的各种敏感问题，在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事业中，我和赖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我与赖老师还有一个难得的缘分，就是我俩是同月同日的生日，而且整整相差二十年。2007年赖老师七十大寿，老毛我五十小寿，打算一块过这个生日，但愿这本书那天也能准时诞生来助助兴。

这才说起《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这本书。赖老师在他七十华诞之年出版的这本书，凝聚着他这一辈子对中国学校体育事业和《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的无限热爱和大智大慧。当然，这本书里更多地凝聚着二十多年来最深邃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凝聚着二十多年来学校体育改革中最敏感的问题和最犀利的观点，更凝聚着二十多年来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每一个曲折和前进的轨迹。

我想建议以下三种人仔细地读一读这本书。

一种人是，试图了解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人，读一读这本书，可从中了解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开放的历史概貌，这是一条把二十多年时空缩小的捷径。

另一种人是，关心中国体育课程和教学改革而又感到有些困惑的人，读一读这本书，可从中获得对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非常独特和有益的视角。

还有一种人是，渴望进行高质量体育教学研究但又感到力不从心的人，读一读这本书，可从中学到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和雄辩的论述方法。

我相信，任何一个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受益匪浅，也会叹为观止。

写此短文，谨表我对赖老师的敬仰，谨表我对他七十华诞和新著出版的祝贺！

毛振明（2007年元旦于北京师范大学）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成长的良师，学术的挚友，尊敬的长辈

拜读赖天德老师用多年心血铸就的《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本二十多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真实写照，凝聚着赖老师对中国学校体育事业的深情厚义，是赖老师执著追求、艰苦探索和理性思维的结晶，也是这位值得尊敬的七旬老人奉献给中国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的一份珍贵礼物！

赖老师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尊敬的良师。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89年那个特殊的初夏，我参加了由《学校体育》杂志与《中国教育报》联合召开的“首都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深化学校体育改革’研讨会”。因为参加会议的都是“青年”，又是“体育理论工作者”，所以，后来人们都称之为“者会”。这个“者会”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的学术例会。当年参加“者会”的同志，除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体育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力研究员英年早逝外，活着的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我国的学校体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多还担负着重要的职务，成了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栋梁之材。赖老师就是当年“者会”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者会”促进了一批学校体育优秀人才的成长。

我认识赖老师就是从“者会”开始的。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参加编辑工作4年的毛头小伙，血气方刚，愣头愣脑，仅凭着参加1987年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修订工作的那点儿“本钱”，自认为肚子里有点东西，对什么问题都爱发表点儿“意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得到了赖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他经常给我提出一些我说不上来，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我十分感谢赖老师，是他的智慧，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从那时开始，我也学会了对什么问题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正像赖老师告诉我的那样：对任何事情或问题，只有能说出它“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之后，才能说自己大体上弄清楚了那件事情或那个问题。

赖老师是这样教导我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记得在1993年和1997年修订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时，修订小组都要请许多专家和老师们来座谈，倾听大家的意见，赖老师作为专家，每一次座谈时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对许多问题，他都提出了许多“为什么”？比如，对体育教学目标的顺序排列问题，他问：为什么要把增强学生体质排在第一位？增强学生体质的生理机制是什么？一个星期只上两节体育课，一节体育课只有45分钟，能达到增强学生体质的目标吗？他认为，体育课程教学的根本任务，主要是要教会学生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的知识和方法，这是长期起作用的，是体育课程教学区别于大众健身的重要标志。因此，他认为，体育课程教学应当把学习和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作为第一位的目标。后来大家讨论认为，现代课程观把学校一切有目的、有组织、与课程有关的活动都纳入课程，实行课内外相结合。因此，从现代课程观的角度来看，体育课程教学可以而且应该把“全面锻炼学生身体，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作为第一位的目标，这既是体育本质功能的体现，也是国家和社会对体育课程的根本要求。赖老师觉得大家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并不坚持己见。但正是由于赖老师提出的问题和与会专家的深入探讨，才使得在阐述大纲三项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时，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和更辩证。其中我也从赖老师身上学到既能独立思考问题，又能虚心倾听他人意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不固执己见等许多优秀品质和辩证的思维方法。

2000年修订小学、初中、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时，教育部体卫艺司委托我担任修订组组长，李晋裕、赖天德、滕子敬、吴键、蔡福全等十几位专家和优秀教师参加了修订工作。对待大纲的修订，赖老师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思想，他总是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讨论“构建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的原则”时，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坚持要把“健身性和知识性相结合”作为一条原则，他说：“到了高中阶段，既要选择那些健身性强、适合学校开展的教材内容，又要重视体育文化的传承，提高高中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选择那些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教材内容。”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把这条原则写入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里。赖老师在体育课程、教材、教学方面的许多见解和思想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为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教材的建设和教学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看着赖老师的《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还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在我

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各个时期，赖老师以他对学校体育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对体育教师的无限深情，以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以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以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与善于博采众长的学风，以他犀利的文笔，为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在不懈地战斗着！对学校体育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片面的观点和做法，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对广大体育教师在实践中总结的好经验，满怀热情地加以歌颂和推广。赖老师是我国学校体育界的一位勇士，一位宣传家，更是一位理性的学者和专家。

在和赖老师的多年接触中，他作为我成长中的良师我感到荣幸，作为我学术上的导师和志同道合的挚友我感到自豪。赖老师是我心目中学习的榜样，是我心目中十分尊敬的长辈。值此《中国学校体育改革评述》出版之际，愿这本著作能够给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以更多的启发和指引，也祝愿赖老师健康、快乐，为中国学校体育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耿培新（2007年春于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文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体育编辑室主任、编审、
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我与《中国学校体育》的情缘

《中国学校体育》杂志从1981年创刊至今，已经整整走过26个年头了。这26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26年，也是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26年。26年来，《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留下了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足迹，记录了广大体育教师辛勤耕耘的业绩，同时也陪伴了我的成长，陪伴了我后半生的人生历程。

1960年，我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原本是学田径的，1972年由于工作需要改教了乒乓球。非科班出身，教鞭分外沉重，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十年寒窗，十年辛苦，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好不容易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赞许，并在乒乓球理论界有了一席之地。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学校领导决定要调我到《学校体育》编辑部去工作。

记得那是在1981年的早春时节，刚刚开学不久，球类教研室的领导找我谈话，说是由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联合主办、由我们北京体育学院承办的一本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的《学校体育》杂志正在筹办之中，因为缺少编辑人员，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问我有什么意见没有。这突如其来的谈话，弄得我不知所措。因为我热爱教师的工作，热爱我的学生，我打心底里不愿去。可我也知道“服从工作需要”的道理。于是我说，如果是征求我个人的意见，不去；如果是组织上的决定，服从。教研室领导觉得我说话实在，也就直截了当地说，学校党委已经研究过了，认为你比较合适，决定调你去。如果你确实舍不得教师的工作，调去后还可以兼上一点课。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1981年3月23日我去报到时，没有想到，这样重要的一份全国性刊物，编辑部竟然设在办公楼顶层的一个走廊里。冬天，北风呼啸，冻得我们手脚发麻；夏天，烈日直晒，热得我们汗流浹背。工作条件之艰苦，当时也可以说是全院之最。但编辑部的同志们似乎都全然不顾，大家都坚信：创业的艰辛是暂时的，杂志的前途是光明的。